

## 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记“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谭军武



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合影(2008年9月26日,南京大学)

随着全球化现实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角力日趋频繁,文化生态日趋复杂,由文化误解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也愈益突出。智慧地处理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冲突、对抗与隔膜问题,不仅是近年来理论界思考的重要话题,更是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战略主题。“跨文化对话”,为解决这些问题铺设了一条有效的操作路径,为文化间的沟通架构了一座理解的桥梁。多年来,中西方思想界和社会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积累了许多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西之间文化与社会互识。但是,“跨文化对话”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处理极其复杂甚至极为脆弱的文化生态;尤其当跨文化对话实践被全球化时代赋予了现实责任时,现有的知识谱系和理论经验就时常显得捉襟见肘。如何运用跨文化对话的手段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处理文化危机、减少文化误解和思想偏执?如何发挥跨文化对话在当代国家—民族话语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提升跨文化对话的水平和有效性?如何实现人类普世性的文化理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转换、梳理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思想资源、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理论系统和方法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跨文化对话”迫切面临的课题。

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对话理论研究和文本—思想实践的《跨文化对话》丛刊,始终走在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时代前沿。为提升中西方跨文化对话的实践水平,开掘跨文化对话研究的理论深度,2008年9月25日至27日,在《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之际,由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

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法语系共同主办的“跨文化对话暨丛刊创刊十周年庆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欧洲跨文化研究院、法国文化传媒协会、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高校和文化机构的国际学者,与来自中国文化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两岸三地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多名专家齐集一堂,共庆《跨文化对话》丛刊创刊十周年。

会议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跨文化对话》中方主编——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与热切的期望。《跨文化对话》法方主编、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比雄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晤会,特致函会议表达了祝愿。

本次研讨会采用主题发言、自由讨论,以及嘉宾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共同见证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十年来的美好瞬间,分享了《跨文化对话》丛刊十年来的思想成果,同时围绕着“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跨文化对话的交往理性”以及“跨文化对话的文学研究”等主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又平等友好的跨语际对话。

### 一、观念与方法: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反思

跨文化对话为什么必要?如何在紧迫的现实要求下,激活跨文化对话的理论资源、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如何生产跨文化对话的独特概念以及对话的理论模式?针对这些理论问题,会议展开了讨论。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执行主席卡蓝默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跨文化对话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思想“压力”,这种“压力”根源于西方文化思维的科学化、普遍化和绝对化,从而形成了文化沟通的障碍。要改变固有的文化认知模式是困难的;而比较研究,以及保持不同文化经验间交流的持续化,是改变困难的有效途径。为此,卡蓝默先生提出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三个维度:一、跨文化的维度。在相异性中寻求相似性,寻求文化间的共同价值;二、时间维度。既回溯历史又着眼未来,从而真正理解现在;三、空间维度。既要有民族地域的视野来理解包容各种文化的差异,也要有国际性全球化的心胸来接纳文化碰撞和观念传播。总之,只有借助跨文化对话的镜子效应,从他者来反观自我,才能共同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立足中国视野,从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现实紧迫性出发,

通过梳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诸多案例,阐述了生成性对话的矛盾与必然面临的四个困难:第一,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亦即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普适性之间的矛盾。当前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发生深刻的割裂,致使对话变得很困难;第二,在对话过程中,保持文化的原有纯粹性和促成文化新变之间的矛盾。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在相互渗透融合中生成新的文化基因;第三,对话中的他者与自我的矛盾,也是阻碍对话的复杂问题。过分强调自我和差异易于封闭难于沟通理解,而过分承认差异又易于在文化的融合中失去自我的身份,这是一个悖论;第四,缺乏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是构成对话困难的又一个阻碍。乐先生认为,在寻求共同话语方面,文学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首先辨析了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普世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寻求人类文化普世价值的必要性;然后重点探讨了寻求文化普世价值的三条途径:一、在各民族文化中原本就有某些具有共通内涵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无疑是有普遍价值的意义的;二、在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文化理路中寻求普世价值。如中国儒家的“仁”、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印度佛教的“慈悲”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就是“爱”,爱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极高的普世价值的意义;三、各民族文化中某些特有的理念往往也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中来寻找某些民族文化特有的理念中的普世价值。最后汤先生还谈到了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由此提出一种理念:后现代社会是“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社会。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教授则指出,跨文化对话必须着眼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从问题出发进行实践。同时,我们与之对话的主体“他们”,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从时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自身的传统以及可能的将来对话;从空间维度上,我们必须与异质多元的文化形态对话。南京大学余斌教授也认为,跨文化对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理论。他引申巴赫金和现代“对话”概念之父马丁·布伯的观念指出,个体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普遍存在的,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中,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而将对话的主体关系从“我—它”转变为“我—你”,应是不同文化间展开对话的理想状态;作为实践的理想对话是困难的。余斌教授认为卡蓝默先生提出的“前提是接受他者也是真诚的”,对跨文化对话实践具有准方法论的意义。在自我的批判中与他者对话,借助于对自身历史相似情境的回溯将他者看似不可思议的反应变成可理解的,在相似性之间建立联系,对跨文化对话是必要的。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陈力川先生纵观当下的全球文化环境,认为人类对待文化的态度必须从“文化间”对话走向“跨文化”。由此,他梳理了西方“跨文化态度”的思想资源,从康德提出的思考他者的相异性的三个原则、柏格森提出的“精神礼貌”的放弃能力、雷蒙·潘尼卡提出的“对话的对话”理论中,总结了“跨文化态度”的三个要素:一是不带偏见地思考;二是分享他者的经验;三是通过其他文化来理解自己。并提出,超越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需要,可能还具有某种道德意义。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借用毕加索的名画《镜前少女》直观而理性地论证了跨文化对话的两个条件:第一,跨文化对话需要知己知彼,需要超越“我一他”的简单二元结构,建立一个对话的“第三者”空间,也就是要实现哈贝马斯曾提出的“视域的融合”;第二,理解镜像的差异。镜像和本体并非是一样的,跨文化对话的条件应该是宽容地对待自己镜像的差异。人对自我的理解是通过他者的反映来认识的,他者具有修正自我理解的作用。没有这两个要件,跨文化对话就无法进行。来自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以学科史的眼光考查了“跨文化”问题提出的背景及其动因,从辞源的角度剖析了“跨文化”作为一种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超越性;进而分析了作为学科的跨文化研究的基本要素:第一,跨文化理论;第二,跨文化资源;第三,跨文化经验。第四,跨文化方法。她特别指出,跨文化理论的基石是“偏形而上,不架构”;跨文化方法的探讨可以专注于三个路径:横向实证、纵向思考、整体研究。

在自由讨论阶段,其他学者也分别就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观念、伦理、路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交流,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的见解。

## 二、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建构

跨文化对话应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必然要在现实的实践中得以展开理论的逻辑演绎。跨文化对话不是书斋里的知识架构,而是实践中的思想累积。因此,构建有效的对话机制和理想的对话平台对于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文化对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刊物,自创刊起,十几年如一日地秉承跨文化对话的思想宗旨,承担起了架通中欧社会的任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跨文化对话》散发出巨大的行动力量。而作为更大范围上的跨文化实践行动,“中欧论坛”在双方之间开展了全方位的深入对话,把许多跨越时空的经验与理念带入了具体的对话活动中。作为一项广域的实践活动,“中欧论坛”却有着文本般的典范魅力。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文本与行动,跨文化对话才从理想追求变成了现实图景。

《跨文化对话》中方执行主编、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深情动容地回顾了《跨文化对话》十年来走过的重要历程,回首了办刊过程中留下的许多美好时光,细致地介绍了刊物的编辑风格与特色,全面地总结了《跨文化对话》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跨文化对话》论丛是中欧第三次文化相逢的产物,它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国际文化合作的背景和坚实的学术思想基础。《跨文化对话》自创刊起,它的中国同仁就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巴黎人类进步基金会等处于一线思考、实践的思想家、知识分子紧密合作,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社会文化热点话题,诸如多元文化共处、伦理与未来社会、协力尽责多元世界、共同治理、教育和社会持续性发展等话题,开设专栏,展开自由的交流探讨,历十年之久,始终恪守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原则,从而使《跨文化对话》论丛成为中外(中欧)知识界、文化界集体思考、自由交流的思想论坛,折射出十年中欧知识界精神交流和思想对话的历史侧影,并将以他独特的思想风貌而载入中欧对话的历史史册。

陈越光教授高度评价了《跨文化对话》的价值,认为作为一本思想学术论刊,《跨文化对话》的学术品位在于它的论文之中;而作为中欧第三次相遇的对话平台,它的道德力量和精神价值则拓展在杂志和学术以外。着眼未来,他对《跨文化对话》提出了三个期待:一、《跨文化对话》应着眼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展开对话;二、《跨文化对话》需适应网络时代人们交流模式的变化,着眼于展开个体层面的对话;三、《跨文化对话》必须应和历史,着眼于下一代,展开与他们的对话。《跨文化对话》杂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思想性、理论性的学术杂志,是一个有精神高度的对话平台。面对新的一代人,《跨文化对话》不能等他们成熟起来以后来当读者,来继承或批判,而是要在这十年中间与他们同行。搭建好《跨文化对话》这个平台,也就是我们责任感的表示。

通过自由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跨文化对话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但是跨文化对话的实施和实践却依然是困难的,遇到了来自文化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阻碍。正是在这种现实境遇和理想探索的困惑中,《跨文化对话》丛刊彰显出其独具一格的历史眼光、思想深度和文化魅力。也正因为如此,《跨文化对话》在未来将需要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也将必然面对更多的挑战。作为中欧知识分子精神操练的平台,《跨文化对话》的完形构建,甚至将影响中欧未来跨文化对话的历史轨迹。

相较《跨文化对话》的深刻性和思想性,“中欧论坛”在对话的广泛性和公共性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作为特殊形式的对话平台,它与《跨文化对话》互相呼应,成为中欧社会文化对话的又一重要途径。

卡蓝默先生从深刻的问题意识切入并提出,在中欧第三次相遇的历史背景下,在伦理领域普遍意义无法追寻的情况下,人类出于寻求解决共同问题和全球共同治理的需要,产生了新的对话类型。“中欧论坛”就是在这种共同治理的需要下产生的,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中西社会体系之间的对话形式,是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论坛。卡蓝默先生回顾了“中欧论坛”创立及发展的历程,对“中欧论坛”的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法及组织进程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中欧论坛是两个社会间跨文化、跨领域、跨主题的对话。通过地理文化多样化、社会职业多样和主题多样性,中欧论坛实现了两个社会间各种话语之间的广泛平等对话。

“中欧论坛”总监、东北师范大学于硕教授从中欧三次相逢的历史背景下来定位“中欧论坛”。她运用文化人类认知学的方法,分析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欧三次相逢的文化特点。同时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正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发展问题,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在加强,但时间上的错位导致了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隔阂却在加深。我们身处21世纪,观念却是19世纪的,政治结构则是20世纪的。三个时间的分离使得人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欧社会论坛就是为消除近年增长的民族—国家偏见和思想文化隔阂,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建设的一个对话平台。同时,于硕教授还全面介绍了“中欧论坛”的伦理定位、价值信念、组织方法和运作现状,对第三届“中欧论坛”的实施情况作了说明。

为体现本次会议在构建跨文化对话平台上的现实努力,延伸思想交锋和精神交流的文化空间,扩大对话领域,会议特别邀请了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作为对话嘉宾,安排了一次学者与作家之间的跨角色对话。

毕飞宇先生从他独具的职业敏感和直观经验出发,在谈到跨文化对话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异于与会学者的观念:从美学的角度分析,距离产生美;由于文化之间都存在距离,所以文化间天然地就存在美的吸引,形成一种天然的互相吸引的磁场效应。他特别指出这种文化间的吸引力是普遍存在的,是来自人类共同具有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因而,在我们讨论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以及跨文化对话时,也应该充分考虑这种本能性的文化相吸效应。此论一出,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引发了一场热烈的文化讨论。另外,在对话会上,毕飞宇先生还与学者专家就“作家的社会责任”、“语言与思想”、“文学的大众化与艺术品味”等问题进行了智慧而又幽默的交流。整个对话活动睿智从容、自由随性、机锋交错,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对话实践。

### 三、他者与社会:跨文化对话的交往理性

跨文化对话最终是自我与他者的一种交往活动,对话主体需要处理自我—他者—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在跨文化语境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对待他者、社会,体现出对话主体的价值立场与实践伦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伦理,最终反映了对话主体在“他者—自我”构筑的视域空间寻求文化意义的努力。而主体在跨文化活动中秉持的文化价值观,将会作为交往理性指导其具体的行为活动。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院长米歇尔·苏盖先生怀着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他者的智慧”。他认为,差异,只要是可辨别的,都不会妨碍对话——不仅可以对话,还能带来有益的结果,关键是要有一种“他者的智慧”。所谓他者的智慧,不是对他者知识优越性的承认,而是一种态度:“当我意识到他者的相异性,将他者视为异于我的人,当我完全接受其相异之处的时候,我表现出的是一种他者的智慧。”他者也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我与世界以及与世界各个个体的关系。他还特别提出了在中欧文化交汇时,必须辨识的一些文化差异,并呼吁中欧双方能用“他者智慧”去面对这些差异、解决问题。

史忠义教授发言中特别赞赏苏盖先生从感性经验出发寻求理解文化差异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认为这样可以克服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极端,对理论研究和文化对话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在文化交往中,既保持良好的文化关系,又尊重他者的文化和差异,“他者的智慧”就显得特别具有经验价值。巴黎第六大学雅克·乐桑教授以自己的经验佐证了苏盖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话存在着诸多困难,要处理好差异文化间的关系,使之和谐共处,“他者的智慧”是一个有益的态度。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宾教授在发言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语境进行了清理,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文化多元化”、“他者”概念的广泛认同,体现出极强的现实价值选择。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文化保守的借口,也可以成为文化开放的理由。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是用这些概念批判自我文化,而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殖民文化理论进入以后,则用这些概念批判西方中心,张扬文化民族主义。新世纪以来,“他者”已经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下,逐渐被忽略。他提出,我们应该借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只有先承认并进入他者,才能谈自我的完善。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则回溯了1743年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次军事碰撞,通过对比中英双方事后的



文献记载,他认为,中英双方一方从利的角度考虑,另一方则以义为出发点,相互误读了对方。当时对对方的用意并没有真正读懂,事后的叙述也就不免自说自话,在游记中掺入创作、想象和夸饰。在自我与他者的社会想象间,暴露出中英双方对对方的诸重隔膜、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和猜度,这种对异邦的想象实际上是将他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巴黎政治学院菲利普·皮埃尔先生和世界卫生组织理事会理事贝阿特里斯·卢米奈女士从社会职业活动入手,解析了跨文化对话的社会性特征及其功能。菲利普·皮埃尔指出,跨文化管理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模式,原有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全球环境下企业国际化的实践进程。从文化管理层面上看,当今企业界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空间。他把自上世纪以来的企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单一文化阶段、多元文化阶段和跨文化阶段。并探讨了三个不同阶段企业管理的特征和处理文化因素的方式。分析了跨文化观念在包括宏观的企业战略、国际谈判和微观的公司行为、职员关系管理中的作用,提出了从尊重他者差异到实现多元文化管理理念融合的跨文化管理理路。贝阿特里斯·卢米奈女士结合自己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经历,指出了文化差异与误解给推行人道救助带来的极大困难。不同文化环境下,人们对疾病的理解、表达以及对治疗的精神想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跟当地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密切关联。再加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有一道文化的鸿沟,导致人道救援的效果极为不理想。她认为要真正实现国际民间组织的人道目标,必须把文化的因素作为重要内容列入行动之中,在跨文化的层面破除偏见,才能应对文化误解带来的挑战。

厦门大学的贺霆教授与台湾政治大学的阮若缺教授则试图借助个案考查,从日常生活行为的文化分析入手,揭示文化交往中的主体行为理性。贺霆教授通过典范个案,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比较分析了中法两国,尤其是法国对中医的接受态度,从跨文化的角度探索了中医走向世界的路径。他认为,就中医的接受而言,在中国主要是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亦即在当下现代性语境中如何理解和接受;而在法国则是文化空间上的跨越问题。近三十年法国主要是在一种后现代语境下接受中医的。中法两国接受中医的文化语境差异,给中医文化的输出带来了挑战。中医输出应该纠正法国人已有的文化想象,绝不可按法国文化的要求来阐释中医文化。阮若缺教授则通过对法国餐饮礼仪文化巨细无遗的分析,试图寻找那些掩盖在饮食细节之下的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她认为,从饮食行为可以窥得一些社会的价值、信仰、阶级与性别观念的异同,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浓缩,跨文化的交流智慧有时往往会在细小的“吃”上得以体现。

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在社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正如拉康所说,“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理解他者就是认同自我;只有当他者被作为自我本体的构件时,深层的无意识共通才能成为可能。毋宁说,他者话语是构成自我的基础。当跨文化对话成为人类构建共同思想生活家园的基本路径、跨文化对话的理论资源成为未来学术研究和国家话语实践的生态条件时,跨文化对话就不仅仅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而是一种打破文化固执和文化霸权的思想利器,必将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和谐发展。基于文化普世性、同一性之上的文化差异化、多元化,将在跨文化对话的视域里,成为理论与实践生成的现实图景,而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

#### 四、理解与汇通:跨文化对话的文学研究

跨文化对话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语言的跨文化转换是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基础。而文学又是不同文化的语言结晶,是跨文化对话的重要阵地与核心战场。在文学研究中渗透跨文化的思想与方法,运用跨文化对话的视野与立场,既可扩大文学研究的版图,也能推进跨文化对话的进程。因此,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认为,我国提出的生态美学观是在海德格尔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莱切尔·卡逊的充满终结关怀的生态批判精神等西方思想资源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这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成果。而其进一步的建设与发展还需继续依靠中西交流对话的重要途径。最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观念,应该通过中西交流对话的途径有所创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史忠义教授则把思想史与诗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力图通过揭示陆王心学和朱熹思想与西方笛卡尔哲学在核心观念、方法论思想上的异同,研究现代性思想与诗学即现代性文艺理论的互动关系。他分析了陆王心学和朱熹思想与笛卡尔哲学的可比性,并比较了两者在思辨和方法论的目的与内容上的差异。复旦大学陆扬教授以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和误读理论,以及李零的孔子阅读为个案,通过对它们的分析,阐述了经典和误读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实践状态。布鲁姆挟解构主义之激进,倡导一种解构式的去圣式误读。而这种去圣化的阅读实践,在李零的孔子阅读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周启超研究员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西方文论,重新肯定并确认了斯拉夫学派的文论价值。他认为,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而颇具辐射力、文学理论跨文化运行

的生动案例;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现代斯拉夫文论更是今日文学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生存与发展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命运形态的精彩缩影。中国社科院的高建平研究员则站在跨文化的角度,认真梳理了我国当代文艺学话语中至关重要的四个关键字:“文学还是出版物”、“形象思维”、“主体性还是主观性”、“本体论”的接受与转化。他认为,这些词通过翻译出现在汉语语境中并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含义,被重新赋予本土文化和学术的内涵。这既是跨文化的理论传播,也是理论概念被本土文化修正的过程。南京大学肖锦龙教授就三个方面分析了斯皮瓦克在《学科的死亡》中提出的“新比较文学观”。他认为斯皮瓦克在研究范围、研究焦点和思想方法等方面,诊断了比较文学的困境。比较文学研究既要倡导斯皮瓦克对非西方主流文化和“属下”文化差异化、具体化、形象化、特殊化的重视,也应该纠正其对文学话语和文学主题的漠视。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从当前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出发,从语言与文化、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入手,从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对翻译的精神与使命作出了思考与界定。他认为,翻译本来就是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和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因此,翻译在“译什么”、“怎么译”等层面上,由语言而入文化,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实现不同文明的跨文化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则提出,文化对话都与翻译有关,跨文化对话几乎始终都贯穿着翻译。然而,翻译不可能完全原样地传达原有文本的信息,编者、译者甚至文本中出现的插图符号,都可能成为翻译过程中,介于原文与译本之间的“不同声音”。跨文化对话并不只是发生在甲乙双方之间的一场对话,尤其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跨文化对话,它必然有第三方也即中介者(如译者等)的参与,并且不可能不经中介者个人价值观的过滤。跨文化必然是一个多元话语声音的对话,这是值得跨文化研究注意的问题。

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考察了当代中西方文学以“狼”为主题的创作,分析了这些代表性作品中“狼”的形象,并运用生态批评中“生存的喜剧”概念对这种文学创作现象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这些创作将启发我们从跨文化的视角对生态环境、动物伦理和现代文明加以反思和开展对话。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宏观总结了20世纪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历史,阐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

接受侧重点和价值取向,指出这些侧重点和取向都是中国文学自身选择的结果。接受者民族的主观因素在这一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了文学接受的着眼点、侧重及偏颇,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现实需求。南京大学董晓副教授的发言以中俄百年文学的亲缘关系为背景,以跨文化的视野,审视中俄两国文坛近年颇为流行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既分析了中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在思维逻辑、价值立场、话语方式上的近似之处,也探讨了产生这种心态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缘由,对中俄两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文化心态作出了较为理性的批判。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教授通过个案分析,以文本为基础,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伍尔夫及其意识流小说对汪曾祺创作的深刻影响。南京大学何宁副教授同样以影响研究的方法,审视了哈代与中国作家的生成关系;总结了哈代在中国接受和阅读的历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审叶向阳先生以17、18世纪的英国旅华游记为对象,探讨了影响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建构或“中国观”形成的诸多因素。进而对目前异国形象研究中普遍忽视形象客体(或称所描述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南京大学黄荭博士回顾和反思了法国对中国“美女作家”作品的译介,对照今昔,分析了西方人对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从过去的单一转为多样,抽象转为具体的理解过程。

此外,美国康奈尔大学颜海平教授、澳门大学龚刚教授、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等也都向会议组委会提交了相关研究论文。

9月27日,研讨会圆满结束。本次研讨会得到了法国梅耶进步基金会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大力支持。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跨文化对话”专题图书展览。跨越十年历程的共23辑《跨文化对话》杂志和一大批近期出版的跨文化研究著作,简约精炼,既彰显了当下跨文化对话的思想活力和前沿话语,也展示了中欧跨文化对话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研究水平,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会后,编委会还就《跨文化对话》未来的办刊思路及如何提升刊物的跨文化对话功能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丛刊将继续关注国内外文化热点和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在栏目设置、话题选择、组稿方式、编排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不断推出中欧知识精英和一线思想家的最新成果,推动中欧跨文化对话的思想进程,通过介入现实拓展跨文化对话在社会实践中的文化建构功能。